

亦有仁义：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尽力播撒“上帝福音”的同时,对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颇为关注。他们积极兴建医院、诊疗所,培育地方医疗人才,治病救人,不遗余力,甚而一些传教士为医疗事业献出了生命。传教士的行为多少改善了近代西北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减轻了民众痛苦,且一批西式医院和医疗人才的出现,将新的医疗技术和医学理念输入西北,为构建近代西北地区的新型医疗卫生体系作出了一定贡献。不可否认,传教士积极参与医疗事业有笼络人心,扩大教会影响,劝导民众入教之目的,但传教士秉持基督博爱惠施精神,努力治病救人,所取得的成效应予肯定。

[关键词] 近代;传教士;西北;医疗卫生

[中图分类号] K 25/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1)03-0108-08

截至1949年,在西安、宝鸡、兰州、天水、武威、平凉、西宁、银川和喀什等地都有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在一些县城和主要城镇也有相当数量的诊疗所。这些医院和诊所为西北地区早期的西医机构之一,贡献甚大。传教士医院大多秉持基督博爱的精神,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放在首位,且新的医疗技术和西医人才的出现,为当时和后续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诚如费正清所言:“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惟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效劳。”^[1] (P4) 如此评价传教士或许有一些溢美成分,但还算较为公允之辞。本文拟在爬梳资料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较为全面的审视,力求推进西北地区传教史的研究。

一、传教士与西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办及其概况

传教士进入西北后,无论是专职医生,还是传教士兼职医生,他们都将治病救人等慈善事业作为达到其传播福音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如美国基督教差会重要负责人司弼尔曾经所说:“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以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2] (P275) 因着这一目的,传教士在西北地区开设诊疗所、创办医院殚精竭虑,不辞劳苦。他们也深知,要在交通不便、路途遥远、民族复杂、社会动荡的西北打开传教的局面,“凡担任游行布道者须青年人员,以能充任医生职务或稍有外科及医药之学者为最合适,否则难期进步也。”^[3] (P558)

1915年,苏格兰人金品三(Dr. Gorge. King)受英国内地会派遣和大工商家博德恩的临

[收稿日期] 2010-12-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危害及禁毒研究”(08JC77002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20090450847);2010年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科研骨干培育项目“近代甘宁青地区地震灾害及赈灾研究”(NWNNU-KJXCXGC-SK0303-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现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1840-1960)”(10CMZ025)

[作者简介] 尚季芳(1976-),男,甘肃张家川人,在读博士后,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研究

终嘱托（1935年，来西北考察的女旅行家林鹏侠在其著作《西北行》中有如斯记载：“缘博君来甘传教，因回民众多，察知回教势力甚强，基督教义，难于输入。于是赴埃及习阿拉伯语文，以便与回民接近，播基督教义。乃壮志未酬，旋即身死。其母痛念其子不已，遂捐其家产之一部，建筑此院，以纪念其子。约费八万金，自民国四年开幕，至十六年，院务甚发达。”），携博母所捐数万元巨款来到兰州，在黄河北创建了以捐资人命名的博德恩医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该院“占地三十余亩，洋式楼房，分三座，内有房屋一百五十余间，分男女医院，麻疯院，及肺癆院等，组织既称完善。地势三面负山，南面临河，风景绝佳，城塞上不易见之结构也。”^[4]（P49）金品三创建该院，历尽艰辛，现存《博德恩医院院长金先生纪念碑》对此有详细记载。此碑主要陈述了金品三的出身，早期经历，创办兰州博德恩医院的艰难经过、卓绝事功以及后来牺牲于黄河险礁上的悲惨事实。博德恩医院的创建实属不易，但是它建成后被称之为“几乎是唯一一所在兰州设备良好的现代化医院”^[5]（P154），是当时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传教士确信“医院工作对开辟宣教事业及消除人民仇教思想具有不可估计的价值”。^[5]（P260）为此他们仍知难而上，千方百计创办医院和诊疗所，挽救了不少生命，渐次取得了民众的认可。囿于材料的限制，我们不能十分明确地列举西北地区传教士医院及诊疗所建立的确切时间，只能就其大概作一说明。

陕西省的传教士医药事业创办于1898年，当时克里西·史密斯医生在西安购地设立医院，与詹金斯医生共同管理，以医务为传教手段，影响遍及全省。^[3]（P448）以此为契机，陕西省的传教士医院陆续建立，主要有英国浸礼会创办的西安广仁医院及三原分院、天主教大荔广慈医院、天主教周至广济医院、天主教宝鸡本笃医院、南郑天主堂医院、安康天主堂医院等。诊疗所在各传教区基本都有创设。^[7]（P291）

甘肃教会医药事业由亨特开始创办，其后1894年Mr. Tornvall来平凉行医，成绩卓著。1904年，内地会的休伊特医生与普雷迪来兰州创办医药事业。^[6]（PP. 259—260）截止1949年，甘肃地区传教士创办的医疗卫生事业较多，大型医院主要有基督教内地会在兰州创办的博德恩医院，德

国圣言会创办的兰州公教医院，美国安息日会创办的西北疗养院。此外全省各教区有公教诊疗所约38个。

与陕西、甘肃相比，青海、宁夏和新疆传教士创办的医院和诊所较少。1891年，内地会英国人胡立理夫妇第一个到西宁传播基督教，1934年到1944年在西宁设立诊疗所，1949年，在贵德设立诊疗所，在化隆设立圣光医院。^[8]（PP. 115—116）1910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康国泰来到青海，在西宁南大街购买地基，修建天主堂。1949年，天主教青海教区在西宁有一所公教医院，在大通和乐都有两个医疗所。^[9]（PP. 107—108）

宁夏创办医疗事业者多为天主教圣母圣心会。1879年，圣母圣心会传入宁夏，比利时籍传教士桑贵仁和闵玉清先后在平罗建立了陈官地教堂和下营子教堂；1922年，银川首建天主堂，1932年，天主堂由比利时调来魏、饶、温三位修女，魏、饶担任教学工作，温临时当大夫，1934年又从国外调来万修女、鲁修女，她们在修女院组织起门诊，挂牌治疗。1944年银川天主堂又在堂院内开设了第二门诊，由修女张惠忠、徐淑德、张明哲等主持。1946年擅长妇产科的德国胡大夫带着两位加拿大医生来到银川，在天主堂开设门诊。^[10]（PP. 119—120）1926年圣母圣心会荷兰籍传教士夏荣昌在中宁鸣沙建堂传教，1933年，明基深到达鸣沙，开始主理教堂，建立诊疗所，该诊所于1942年得到中宁县县长张业成认可，正式备案成立。^[11]（PP. 236—242）此外，中卫、平罗和贺兰等县也设有规模不等的诊疗所，当时宁夏“凡住有神甫、修女的教堂都设立了门诊所施药看病。”^[12]（P170）

新疆主要活动的传教团体为内地会和瑞典宣教会。1892年，瑞典宣教会进入喀什噶尔，并以此地为中心开展工作，先后建立喀什噶尔、莎车、韩城和英吉沙四个宣教师驻地，附带诊病工作。1919年，喀什噶尔、莎车、英吉沙等地的小医院共收住院病人四十多人。各诊疗所治疗病人达一万二千人，宣教师医生共出诊八百六十次。^[3]（P552）斯时叶尔羌也建有诊所。马达汉写到：“在叶尔羌，我拜访了在那里工作的一名瑞典传教士，古斯塔夫·拉奎特。除了传教外，他还广泛开展医疗工作，……在传教站里有一个配备齐全的药房，当地居民付很少的药费就可以从药房拿到药品。那里有成套漂亮的、发着亮光的医疗器具，还备有常见病病人的免费病床。”^[13]（P49）

以上为传教士在西北地区设立医院和诊疗所的一个简况，这些新式医疗机构的建立，给西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影响深远。

二、传教士创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对西北社会的贡献

传教士在西北地区开办的医疗卫生事业，目的在为传教服务，但平心而论，医院和诊所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民生是不可否认的，这不仅缓解了缺医少药现状，减轻了民众疾病痛苦，而且培养了一批西式医学人才，初步改变着民众的卫生意识，也使民众对西医有了正确的认识，这些或多或少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医学近代化和社会变迁。

首先，传教士医院和诊疗所将西药引进西北地区，积极诊治疾病，挽救了诸多生命。

长期以来，中医是中国民众赖以维持生命的主要保健手段，其功用不可磨灭。但问题是中医医生数量少，名医更少。以陇西县为例，据1949年10月统计，当时陇西全县16万人口，但“只有个体中医113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花儿先生’（指专种牛痘的大夫），这些人大部分是自学或祖传中医，以农为主，医病只是业余捎带，且80%都不带药品，只诊病开处方”。^[14]（P88）同时中医治愈速度慢，治愈率低，一旦大型传染病袭来，中医难以抵挡。1940年冬季，中卫县白喉大流行，后传播于吴忠。白喉是一种很严重的呼吸道传染病，易感染者是一岁以上十岁以下的幼儿，“因为没有预防措施，又不作隔离治疗，所以迅速造成流行，发病率占儿童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死亡率约占发病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此外，由于缺乏公立妇幼保健机构，没有妇产科医生，产妇在孕期无条件做产前检查，分娩时不懂消毒灭菌，产妇和婴儿的感染机会很多，旧时流传：“坐头首月子（指第一胎）如同过一次鬼门关”、“只见母怀胎，不见儿走路”，^[15]（P71、P74）因此死于妇婴病和产褥热、破伤风的不在少数，而中医对此无能为力。

当时，传教士创办医院和诊疗所，将目光深入地方基层社会，利用西方医疗技术积极诊治疾病，其意义不可低估。1882年乾县基督教会协同会建立教堂兼施医药，1929年该县大旱，饥馑遍野，传教士立即展开了救济工作，对身患重病者积极施救，“北大街摊贩张彦明老汉，身患疥疮，周身腐烂，疼痛难忍。杨牧师目睹他可怜状况，立即

叫佣人田福生，给张老汉打针用药，两天后病好痊愈。张老汉为了报牧师之恩，买了几十鸡蛋，看望了牧师夫妇。同时杨牧师也常为信徒急患者赐药，信徒都很敬仰感激。”此后当地民众为表感谢，特意给杨牧师立碑撰文，又挂了一面‘卧仁存心’的大匾”。^[16]（PP. 150—151）

1929年，青海成立公教医院，分内外两科，有40余张病床，每天门诊人数约有40—50人左右，收费较低，无力治病的亦可免费治疗，^[9]（P110）民众称便。

1933年，明基深管理中宁鸣沙天主堂，明懂医学知识和技术，又为人和善，来者不拒，又加上免费医治，有不少患者前来就医，“当时带来的药物多是最好的西药，如德国的‘606’、比斯米特、伤寒疫苗和以后进口的盘尼西林、磺胺类等药品，治好不少的病症，如梅毒、淋病、麻疹、天花、伤寒、白喉等”。明还利用与当地政府驻军的关系，积极参与传染病防治。1936年，中宁流行白喉传染病，死亡孩子甚多，“明神父通过当地驻军马鸿宾八十一军的王团长，从兰州搞来了几瓶抗白喉毒素，马上给15个住校学生注射，结果使他们都脱险痊愈”。^[11]（PP. 241—242）

1935年，清水县天主堂内几名德籍修女，开办诊所，“起初仅以治疗疮痍为主，后又治头疼感冒，因其效果好，看病者越来越多，也有严重患者，如大疮等症，以后便增添打针，如潘尼西林（现名青霉素），六零六（即新坤凡那明）等，疗效更好，有些穷人子弟无钱看病，当时药费仅要半价或者欠账，甚至太困难者即行免费”，受到民众好评。^[17]（P68）

在新疆，瑞典传教士起初的主要工作就是“治病救人，为儿童上课”，^[18]（P40）他们称自己“最成功的活动是治病”，而且“这类活动每年有增无减”。雅林这样描述喀什的传教士医院：“白天，我看到病人和残疾人蜂拥进入医院大门，……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医院同样都给他们治病。来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对穷人，看病免费，那些掏得起钱的人则要付钱。喀什噶尔的瑞典医院声名远扬。”^[19]（P79，P203）传教士日常的医疗诊治工作非常繁重，每天要接待大量的病人，天主教的梁萌德神父在每天十一时左右，“给有病的教徒或非教徒施诊施药，有时还到病人家中诊病”，患者感念。^[20]（P203）

显然，传教士在西北地区的医疗救助活动，给

当地民众就医提供了极大便利，缓解了各地人民无处看病的困难；他们将西药带到边疆地区，对西医在西北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传教士医院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器械带到西北，且培育了一批懂西医的人才，为西北地区西医的开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创建于1915年的兰州博德恩医院，系当时甘肃地区最现代化的医院，“当时院内的医生及护理人员多为来自英、美、澳、德等国家。在医疗技术上，可以剖腹摘除肿瘤，这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也不多见。”^[21] 1929年，兰州天主教公教医院建立，发展到1932年，业务大有起色，医护人员由原来的一、二十人，扩大到三十人左右，设有内科、外科等科室，有化验室、药房、X室、手术室、住院部等，设有病床一百张左右。当时医院门诊应接不暇，业务繁忙，住院部也是如此，特别是甘南、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患病、梅毒的比较普遍，该医院使用德国生产的对上述病症具有特效的六零六药剂和针剂，治愈率较高，影响较大。^[22] (P179)

1924年，天水天主教公教医院建立，“开创了天水西药治病的先声”。法来善主教先后从德国聘来医学博士杜回春、奥地利医学博士邓玉池，震旦大学医学博士徐苓和、东北籍留日医学博士刘云青，奥地利籍医师彭钟英，德意志籍医师蒲肋纳等，一时人才济济，实力雄厚。^[23] (PP. 9—10) 该医院有当时比较先进的医疗设备，其中有15mA X光机1台，手术床2台、担架2付、显微镜3台、电疗机2台、太阳灯1具，坐椅、洗牙机各1台，各种常规器械、普通手术器械齐全。全年门诊工作量一般在28000—30000人次之间。住院治疗年约300人。就诊病人中工人约占70%，农民约占5%，党政界工作人员约占15%，商界约占10%。除上述医疗业务工作外，还曾做过一些防疫注射、种牛痘疫苗、学生体检的工作。^[24] (PP. 176—177)

传教士医院在培育医学人才方面，也尽其所能。兰州博德恩医院开办了四年制的医学班和护士班，培养了许多医生和护士，在地方发挥了较大作用，当时甘肃地区许多地方医疗机构的医生都在这所医院学习过。^[25] 如英国内地会传教士任守谦为打开天水传教局面，选送了天水的吴杰天、芦恒山，甘谷的刘基、巩守仁在博德恩医院学习。他们于1929年毕业后，在天水、甘谷行医传教，号称陇南的‘四大大夫’，把西医传到陇南一带。^[26] (PP. 109—110)

1908年，天水内地会英国传教士韩牧师、丁秉衡在北关人民路建立福音堂。韩牧师系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精通西医，救人很多，他培养了曹泰和曹约翰两名西医人才。他们学习了药理学、药典和各种常见病的治疗，并在韩牧师的亲身指导下，能给群众治疗一般性病。1910年，曹泰、曹约翰等人开设了仁医堂药房，销售西药，对穷困的病人免费治病，挽救了好多人的生命。甚至陇南其它13个县的患者，也前来看病买药。^[26] (PP. 185—187)

青海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贾立克在化隆设立圣光医院后，“因手术高明，每日就医来的病人，约在250人左右”，青海学生星占诚、石生贵和星启光等六人跟其学习医术，在青海的卫生事业中发挥了一定作用。^[27] (P55) 在宁夏，1933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甫在银川西大街成立天主教医院，张明哲、任子仪和王秀清等在该院学习医术，后来开办了私人诊所，救治贫困百姓。^[28] (P147) 新疆瑞典教会在“当地(莎车)招收工作人员30名，主要是为当地百姓看病”，在喀什由他们培训出来的西医，“医术很高，深受人们尊重”。^[29] (PP. 160—161)

上述事实说明传教士医院将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器械输入西北，引进一批造诣较高的医护人员，不仅救治了大批病痛患者，而且积极为西北地区培育西医人才，为当时及后来西北西医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最后，传教士医院现代化的组织模式，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等先进医疗理念值得肯定。

在传教士医院和诊所里，一些新型的西方医院组织模式开始实施运行。天水公教医院内部设有医务、药剂、总务、会计、文书5个股。每股设股长1人，其他人员则以其工作性质分隶于各股分工办事，办事秩序井然。医院科室设置有儿科、外科、妇产科、理疗科，还有手术室、化验室、药房、X光室。儿科可诊治常见多发病及一些疑难之症，外科可做一般常见肿瘤、腹部手术，并治疗皮肤病、花柳病、眼疾、牙病、耳鼻喉疾病等，妇产科主要治疗妇科常见病，以及分娩、难产、剖腹产、产前检查，化验室做血、粪、尿、痰常规化验，放射科只做胸透，理疗科做慢性疾患电疗。截至1951年，工作人员有主任医师1人、医师2人、护士5人、护士长1人(兼)、化验员2人、助产士2人、见习护士5人、X光技术员1人(兼)、牙科技士1

人(兼)、药房主任1人、调剂员2人、事务员4人、工友9人。拥有病床46张,其中特等病房2间1床,一等病房8间8床、二等病房17间17床、三等病房9间20床。各病室被单清洁,玻璃窗户,布、竹帘,纱窗俱全。病房内装电灯,置有躺椅、坐凳、桌子、茶几、火炉、痰盂、面盆、水壶等。病房光线充足,床位合乎要求。^[24](PP. 176—177)不难看出,天水公教医院俨然是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其组织模式、科室设置和病房布置都基本符合现代医院的标准,在当时有很明显的示范性效应。

在传教士医院和诊所里供职的医生,多数医德高尚,加之本身的教徒身份,对待患者平易近人,一视同仁。1948年,天主教德国修士董鸿烈到武都城关开办诊疗所,“他在武都行医,以济世救人,关心病苦为天职,尤乐于照顾贫苦病人,每日治病不下60—70多人次,诊断、注射、配药莫不亲身参与逐一过目,认真负责,于百忙中,仍不断研习医理。故深受群众敬重”。^[30](PP. 210—211)天水公教医院医师徐苓和“医理较深,尤对内科病理学有一定建树。疾病诊断准确,精通英、法两国文字,对病人热情和蔼,对危重患者及时抢救治疗,被救活者甚多。”曾在该医院挂号室工作二十多年的牛玉海视病患者如至亲,特别是对急诊患者,总是先将病人亲自送给有关大夫先行诊治,而后补办手续,挂号。他业务极为熟练,工作效率高,通过本职工作,体现了救死扶伤精神,至今为当地人传颂。^[24](P180)

宁夏中宁鸣沙天主堂从事医务工作人员的医德,也值得称道。“他们对待病人,恩爱如一家人,急病人之所急,遇到急需,不分白天黑夜都出诊看病,他们还送药上门,深入患者家里诊治护理。明神父为治好当时流行的白喉传染病,日夜操劳,废寝忘食,以致于染上白喉病毒,脖颈肿胀,疼痛难忍,但他以病人为重,而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11](PP. 241—242)新疆内地会的传教士郎道尼兹·美斯再尔(即马慕杰, Percy Mather),则“不分昼夜风雨,应诊一切病症”。^[31](P110)天主教在晚清传入陕西紫阳后,1946年,增设诊室,一度受到欢迎,“当地群众说:‘神父、修道对人和气,看病耐心,都愿去那里治病’”。^[32](P206)

有些传教士医生在救济患者的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前述胡立理夫妇在西宁建立诊疗所后,对群众就诊不收药费,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

赞赏,有时遇见难产也出诊助产。胡立理妻有一次给西宁东关一位回族妇女接生,时间太长,直到晚上城门已关闭,不能回家,因天气严寒受冻一夜,患重感冒而死于西宁。^[33](P101)1929年,武威内地会传教士贝尔彻夫妇,在瘟疫流行中,“因照顾病人染上斑疹伤寒而丧生”。^[34](P251)1931年,内地会英国牧师李春雷夫妇来中卫传教,中卫大旱,饥民甚众,患病者无数,李尽力为灾民施诊治病,“不幸李春雷牧师染上了伤寒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35](P115)1931年,陇西县康家湾村爆发了鼠疫,短短一个月时间,157人死亡,村中几乎断炊,“城中天主教堂龚神甫(奥地利人,西医内外科医师),曾与个体行医的天水籍人吴宝绮及其学徒王大卫前往康家湾治病,口戴麝香罩作为防护措施,但仍被感染,龚回天主堂后即死亡”。^[36](P130)

传教士医院的先进组织模式以及为了患者不惜牺牲自我的医疗理念,使得人们对西医逐渐有了认同感。1934年6月5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仁贤,因患喉癌,前往兰州天主堂医院诊治,不幸身亡。对于这样一起医疗事故,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该生是否由打针而死,本系何病?病已至何种程度,所打者何种药水?一经考究,便可水落石出,可不必先事研究。但是兰州市上,必有益加怀疑西医究不妥当的论调发生,期影响所及,必有许多中医无办法,而西医能治的病,也不给西医诊治,间接的又将坑死若干人。其实这是这一个‘洋医生’个人学术问题,或竟是病已不起的事实,决不可因此抹煞一切。天热了,时疫的权威又要高涨了,疾病是谁都免不了的,请大家辨明这一点。”^[37](P2—3)王仁贤之死或系误诊,或系病人膏肓,都未可知,但一概排斥西医则不可取,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一部人的态度。

三、余论

相较于东南沿海,传教士在西北地区创办的医药卫生事业不仅数量少,覆盖面小,而且医护人员短缺,难如人意。1920年,全国教会医院共有326所,福建有31所,广东27所,山东20所,而陕西、甘肃仅有2所。甘肃每所教会医院平均负责62700平方英里,陕西每所教会医院平均负责37645平方英里,而教会医院最为发达的福建每所教会医院仅负责1130平方英里。^[31](PP. 620—621)每百万人口中福建有外国医生2.4人^[31]

(P622), 而甘肃每 300—400 万人口中仅有外国医生 1 人^[61] (P260)。当时全国教会医院共拥有病床 16737 张^[31] (P623), 而陕西两所医院共有病床 114 张^[61] (P448), 甘肃两所医院共有病床 220 张^[61] (P260)。就医生的负担而言, 全国每一名外国医生负责的病床平均为 37 张, 福建负责 59 张, 而甘肃为 110 张, 为全国外国医生负担最重的一省。^[31] (P623) 不难看出, 陕西和甘肃是“国内各项教会事业最不开展的省份”^[31] (P622), 而甘肃“是全国最不被重视的一省”。^[31] (P532)

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这种情况仍未有多大改善。时在陕西龙驹寨传教兼做医生的司务道回忆道: “一九四七年夏天, 我在龙驹寨实在忙得透不过气来。每一天我要照顾百多位病人, 当中, 也有许多急病是我不知道怎样诊治的。”^[38] (PP. 116—117)

西北地区传教士创办的医药卫生事业不发达, 首先与民众对基督教、天主教的敌对认识有关。众所周知, 近代基督教是随着洋枪洋炮大规模进入中国的, 因之老百姓心目中一直对其抱有抵抗心理, 以致西方宗教很难在西北地区立足。1900 年, 内地会挪威籍传教士王耀基来到陕南商县传教, 人民即以“不接待洋人, 不信洋教”强烈反对。“王初到商县时, 城关居民皆不理睬, 旅店亦不招待, 因此, 王白天在街上传道, 晚上只得在旅店房檐下阶台上卷(原文如此)息。但至第二晚再去该地时, 群众早已用污水将台阶、门口泼湿。王以后使用高价暂租到房子一所, 但仍常有人用石头把门堵塞。有一次, 王早起开门时, 石头竟将脚腿砸伤, ……群众有时还将粪便倒在他的门口, 涂在门上。”王只得离开商县, 前往丹凤, 在丹凤“虽于 1901 年春租到孙天顺房子居住, 但经常不敢上街活动, 一上街便被当地群众和儿童在后边用石子乱砸”。1937 年, 内地会传教士诺慕到山阳农村进行传教, “当他们在山阳磨沟地方搭起帐篷, 还未传教, 当晚就被当地群众把帐篷掀倒了。后来诺慕无奈, 不得不撤回山阳县城”。^[39] (PP. 147—149) 可见, 民众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是十分强烈的, 这种情势势必影响其大规模创办医药卫生事业。

其次, 西北少数民族众多,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 藏族民众信奉藏传佛教, 对陌生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产生排斥心理自是必然。在甘肃地区的传教士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 “本省 1/3 以上之居民为穆斯林, 又有藏、蒙、土番诸民族杂居其中, 极难受

基督教之信仰。”^[61] (P254)

再者, 西北山峦绵亘, 交通阻塞, 人烟稀少, 政局不定, 这些都是影响传教士创办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因素。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利因素, 但传教士在西北地区创办的少数医疗卫生事业仍使得一部分人受益。尤为可贵的是, 传教士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办医院, 效果良好。博德恩医院在兰州不仅收治大量的回族和藏族病人, 还在回族聚居区临夏建立了一所新医院, 诊治病人甚多, “在前两个星期就已经做了 14 个三氯甲烷手术和 20 多个小手术, 并且已经治愈 260 多个病人。这个医院是在内地会的赞助下建立。包括外国和中国医生的居住区, 医院的四分之一为病人居住区。59 个大小不一的房间, 所有这些都精打细算, 花费 4500 美元。这个医院的建筑物或至少主要部分都来自英国友善人士的慷慨捐助。甘肃人民主要睡觉的地方叫炕或砖床, 由于燃料的缺乏, 炕很实用, 在冬天它晚上可以睡觉, 白天可以作为一个贮藏室。新医院也遵从了甘肃人民的这个习俗, 相当于 56 张床的 14 个炕建成。这里没有住院医生, 然而在适当的时候, 这一切都会安排妥当。这个医院由兰州的乔治·金先生主持。”^[40] (P128) 该医院是建立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所新式医疗机构, 发挥了一定作用。

传教士创办的医疗机构不仅在当时诊治百姓疾病, 而且在建国后仍发挥着余热。1911 年, 陕西三原成立的英华医院, 解放后发展成为三原县医院。^[41] (P146) 1947 年, 在宝鸡成立的天主教本笃医院, 解放后成为宝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部分。^[42] (PP. 141—142) 1915 年建立的兰州博德恩医院解放后被兰州市人民政府接收, 改为兰州市人民医院, 现发展成为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1929 年成立的兰州天主教公教医院解放后由甘肃省中医院接收改为门诊部。1935 年成立的西北疗养院, 解放后甘肃省立医院接收改为门诊部。^[43] (P175) 1930 年平凉创建的公教诊疗所, 1956 年改为西医联合诊疗所, 成为现在平凉市人民医院的前身。^[44] (PP. 76—77) 1943 年成立的陇西县公教医院, 解放后合并到陇西县卫生院。^[45] (P134) 1948 年创建于武都城关的诊疗所,^[46] (P236) 解放后由武都专区卫生院接收。^[30] (PP. 210—211) 宁夏贺兰 1932 年开办的诊疗所, 解放后在县政府卫生科的领导下担任着四区预防医疗工作重担。^[47] (P100)

传教士借创办医院和诊疗所为民众诊病, 自有

其传播福音的目的。但传教士此种作为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西医西药进入西北, 不仅给痛苦中

的民众一线希望, 而且推动西北地区医药卫生事业向近代化迈进, 确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 [1]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上卷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2]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3]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 (中)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4] 林鹏侠著, 王福成点校. 西北行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 [5] Kiang Wen-han. The Northwest Advances [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March, 1940.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Editorial Board Headquarters, Missions building, Shanghai China.
- [6]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 (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7] 王雪. 基督教与陕西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8] 马毓. 青海基督教简介 [G].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 1982.
- [9] 王册. 天主教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 [G].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 10 辑, 1982.
- [10] 刘静山. 银川市天主教简史 [G]. 银川文史资料第 4 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 [11] 刘静山. 天主教传入中宁 [G]. 宁夏文史资料第 25 辑,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 [12] 何兆国. 天主教在宁夏的传播与发展 [G]. 银川文史资料第 1 辑, 1983.
- [13] 马达汉著, 王家骥译.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 (1906—1908) [M].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 [14] 贾焱. 陇西县农村医疗卫生组织的变迁 [G]. 陇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 1996.
- [15] 夏荣久. 解放前吴忠的医药和疾病流行史 [G]. 吴忠文史资料第 1 辑, 2001.
- [16] 杨培成. 基督教在乾县的产生 [G]. 乾县文史资料第 2 辑, 1986.
- [17] 曹慕植. 天主教在清水的传入 [G]. 清水文史第 1 辑, 1989.
- [18] [英] 凯瑟琳·马嘎特尼著, 王卫平译. 外交官夫人的回忆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 [19] [瑞典] 贡纳尔·雅林著, 崔延虎、郭颖杰译. 重返喀什噶尔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 [20] 吉六. 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 [G].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9.
- [21] 参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网站。医院介绍 (www. d2yy. cn).
- [22] 张本笃. 兰州公教医院情况点滴 [G].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 1983.
- [23] 赵经农. 天主教天水教区概况 [G]. 天水文史资料第 1 辑, 1986.
- [24] 卫志. 解放前天水的教会医院及诊所 [G]. 天水文史资料第 5 辑, 1991.
- [25] 李爱如. 甘谷县基督教的产生及发展 [G]. 甘谷文史资料第 6 辑, 1990.
- [26] 熊绿天. 第一个在天水开业的西医 [G]. 天水文史资料第 5 辑, 1991.
- [27] 伦泉连. 近百年来的西宁基督教会 [G]. 西宁城中文史资料第 1 辑, 1988.
- [28] 赵贵春. 宁夏解放前医药卫生概况 [G]. 银川文史资料第 3 辑, 1983.
- [29] 一江. 瑞典传教士在喀什噶尔 [G]. 喀什市文史资料第 4 辑, 1989.
- [30] 贫振铎. 武都县天主教的诊疗所 [G]. 武都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 1990.
- [31] Mildred Cable, Francesca French.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Percy Mather of Central Asi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35.
- [32] 北海. 天主教在紫阳始末 [G]. 紫阳文史资料第 1 辑, 1986.
- [33] 星天光. 回忆西宁西医的创始及发展 [G]. 西宁城中文史资料第 2 辑, 1988.
- [34] 斯文·赫定著, 江红、李佩娟译. 丝绸之路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 [35] 牛星奎, 王国保. 宁夏各县基督教会概况。中卫县教会简史 [G]. 银川文史资料第 3 辑, 1983.
- [36] 贾焱. 陇西县康家湾鼠疫流行始末 [G]. 陇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 1995.
- [37] 峰. 洋医生杀人的影响 [J]. 海泽第 11 期, 1934-6-15.
- [38] 司务道著, 尚维瑞撰写. 陕西羚踪: 司务道教士自传之一 [M]. 香港: 灵实医院灵实福音布道团, 1983.
- [39] 高映明. 基督教在陕西商洛地区活动概略 [G]. 商

- 县文史资料第3辑, 1985.
- [40] New Hospital in Kansu [J].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 February, 1925.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Editorial Board Headquarters, Missions Building, Shanghai, China.
- [41] 张冠儒. 三原县中华基督教会有关资料 [G]. 咸阳文史资料第3辑, 1987.
- [42] 张正吾. 宝鸡天主教本笃医院始末 [G]. 宝鸡文史资料第5辑, 1987.
- [43] 刘毅民. 解放前兰州地区医药卫生状况 [G].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983.
- [44] 马骥. 天主教在陇东的发展 [G]. 平凉文史资料第1辑, 1989.
- [45] 李恒山. 漫话解放前的陇西医药 [G]. 陇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995.
- [46] 贫振铎. 天主教在武都的活动情况 [G]. 武都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988.
- [47] 刘华国. 天主教在贺兰的传播 [G]. 贺兰文史资料第2辑, 1986.

With Kindness and Humaneness

—Missionaries from the West and Medical Health System in Modern China

Shang Ji-f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The missionarie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modern China, not only focused on evangelizing Gospel, but concerned about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in northwest China. They made devotions to establishing hospitals, training medical workers and treating illnesses, some even paid lives for medical work. Due to this circumstance, the situation of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medical services had been improved and the pain of the people was eased. The western style hospitals and newly trained medical workers, which brought new concepts to local people, were important to the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in northwest China.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final purpose of the involvement in local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was the penetration of Christianity, however, the philanthrop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attempt to cure the illnesses should be praiseworthy.

[**Key words**] modern China; missionary; northwest;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责任编辑 胡小鹏 校对 古跃)